

 国家治理现代化丛书

丛书主编 俞可平



 国家“十二五”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新中国成立65周年主题出版项目

大国治理

杨雪冬 张萌萌 / 主编

*Governance of Major Countries
in the Globalisation*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国治理 / 杨雪冬, 张萌萌主编.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5. 1
(国家治理现代化丛书 / 俞可平主编)
ISBN 978-7-5117-2426-7

- I. ①大…
II. ①杨…②张…
III. ①国家-行政管理-文集
IV. ①D03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91688 号

大国治理

出版人: 刘明清
出版统筹: 贾宇琰
责任编辑: 杜永明
责任印制: 尹 珺
出版发行: 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 北京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乙 5 号鸿儒大厦 B 座(100044)
电 话: (010) 52612345(总编室) (010) 52612341(编辑室)
(010) 52612316(发行部) (010) 52612317(网络销售)
(010) 52612346(馆配部) (010) 55626985(读者服务部)
传 真: (010) 66515838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字 数: 289 千字
印 张: 19.75
版 次: 2015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70.00 元

网 址: www.cctphome.com 邮 箱: cctp@cctphome.com
新浪微博: @中央编译出版社 微 信: 中央编译出版社(ID: cctphome)
淘宝店铺: 中央编译出版社直销店(<http://shop108367160.taobao.com>) (010) 52612349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 北京市吴栾赵阎律师事务所律师 闫军 梁勤
凡有印装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电话: (010) 55626985

“国家治理现代化”丛书总序

俞可平

“治理”原来是一个社会科学的术语，自从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后，它便成为中国政治的热门话语。对其含义的种种不同解读，甚至各种争议也随之产生。有人认为它是西方的政治概念，有人则认为它在我国古代就早已有之。其实，“治理”就其字面意义而言，就是“治国理政”。作为人类的一种基本政治活动，它存在于古今中外的每一个国家和每一种文明之中。然而，作为政治学的一个重要新概念，它则是当代的产物。治理不同于统治，它指的是政府组织和（或）民间组织在一个既定范围内运用公共权威管理社会政治事务，维护社会公共秩序，满足公众需要。治理的理想目标是善治，即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管理活动和管理过程。善治意味着官民对社会事务的合作共治，是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最佳状态。

从统治走向治理，是人类政治发展的共同规律，不仅适用于西方国家，也同样适用于东方国家。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把“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重大的理念创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或者简称为“国家治理现代化”，这一新的概念是中国共产党的创造，而绝不是对西方治理理论的照抄照搬。实际上，在英文文献中至今还没有与“国家治理现代化”

相对应的概念。国家治理现代化这一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不仅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实，也完全符合人类政治发展的普遍趋势。另一方面，也要实事求是地承认，对现代国家治理系统深入的专门研究，最初起源于西方发达国家。然而，我们不能因为发达国家率先进行了“少一些统治，多一些治理”的政治变革，并且对治理问题率先进行了研究，发展起了各种治理学说，就认定这只是西方的理论或实践。一种理论或实践，只要反映了人类社会的共同规律，无论最初在哪个国家或地区出现，它们最终都会在其他国家和地区发生作用，并成为人类文明的共同价值。今天我们已经须臾不可离开的民主、自由、人权、法治、现代化、工业化、全球化等等，莫不如此。

中共中央编译局比较政治与经济研究中心，是国内最早研究治理理论团队之一。它首先从译介国外的治理理论开始，然后结合我国的治理实践，致力于建构中国自己的治理理论，并且努力推进我国的治理现代化。这个团队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先后就政府治理、社会治理、基层治理、全球治理和生态治理等专门领域进行系统而深入的研究，承担过“全球化与治理的变迁”、“中国公民社会的兴起与治理的变迁”、“中国地方治理创新”、“中国国家治理评估”、“中国社会治理评估”、“社会管理创新”、“城市治理现代化”、“全球治理与和谐世界”、“生态治理与生态文明”等重大课题，发表了大量研究成果，并且建立了国内最权威的“中国地方政府创新案例”和“中国社会创新案例”数据库。

有幸列为国家“十二五”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的这套“国家治理现代化”丛书，由《大国治理》、《政府治理》、《社会治理》、《基层治理》、《全球治理》和《生态治理》6本书组成，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比较政治与经济研究中心这个研究团队在治理方面的主要成果。各卷分别由何增科、杨雪冬、曹荣湘、陈家刚、周红云等研究员任主编，他们都曾经是这个团队的核心骨干，现在不仅是中央编译局相关业务部门的主要领导，而且分别成为国内相关研究领域的代表性学者。人们经常说，理想的研究目标，就是“既出成果，又出人才”。去年，我们编辑出版了国家出版基金项目——10卷本的“中国的民主治理：理论与实践”丛书，现在我又看到了这套6卷本的“国家治理

现代化”丛书的出版。这使我不无自豪地想说：我们基本上达到了这一理想目标。作为这个学术团队的创立者，一方面，我要对这些年轻同事们所取得的成就表示热烈的祝贺，另一方面，也要对他们的合作与贡献表示诚挚的感谢。当然，本丛书除了比较政治与经济研究中心的成果外，也收录了国内同行的其他若干成果。在此，我对这些作者也一并表示感谢。

2014年11月10日于京郊方圆阁

导 论

21 世纪以来的全球化进程

杨雪冬

21 世纪以来，全球化进程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有人将其称为“第三波全球化”，以与 19 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的“第一波”、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开始的“第二波”区别开来。^① 全球化既是一个历史进程，也是推动社会生活诸领域发生变革的历史力量，因此其体现的形式和产生的影响是不断发展的。与前几个阶段的全球化相比，21 世纪以来的全球化（或者更准确地说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来的全球化）更为充分生动地证明了这一点。具体而言，21 世纪以来的全球化进程有以下主要特点：

第一，全球化与市场化、城市化、工业化、信息化紧密地交织在一起，形成了相互影响、相互推进的复合进程。毫无疑问，这些都不是什么新变化，但是能够在全球范围内发生，并且形成复杂多样的互动关系则是一个新现象。全球化首先是经济全球化，是以作为资源配置的主要机制——世界市场的发展为基础的。从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世界各国都在进行着市场化改革，世

^① Will Straw, Alex Glennie, “The Third Wave of Globalisation”, *Institute for Public Policy Research Report*, January 2012.

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国已经达到了 157 个，21 世纪以来加入的国家有近 20 个，其中包括中国、俄罗斯等大国；世界贸易谈判不断深入，各国关税在种类和幅度上不断降低；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为资本、商品、信息、人力资源等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流动、国际劳动分工的扩大和深化提供了制度性条件。

城市化的发展将更多的人口集中在特定的地点，并且推动了人口的流动。发展中国家的快速城市化以及全球性城市的出现成为了 21 世纪以来城市化进程的两个突出特点。从 20 世纪后半叶开始世界范围的城市化进程进入了发展中国家主导的时代；如果说 20 世纪是发达国家完成城市化的世纪。那么 21 世纪将是发展中国家实现城市化的世纪。“世界正处于高速的‘最大城市化’中，欧洲和北美、南美洲已经基本完成城市化。因此今后大部分人口增长都将被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吸收，到 2030 年新增人口将增加一倍。”^① 在数量不断增多的城市中，一些超大规模的“全球城市”^② 的作用日益突出，成为了世界范围交往的中枢，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具有强大的影响力和控制力。尽管发展中国家拥有的超大城市不断增多，但是全球的城市依然主要分布在发达国家，因此城市化进程在某种程度上加深了全球化的不均衡性。

工业化的深入发展既体现了各国对比较优势的有意识地利用，也为国际劳动分工的深化提供了更大的空间。中国、巴西、墨西哥、印度、南非等作为新兴市场国家，不仅吸引了大量的对外投资，而且成为世界市场上许多产品的提供者和消费市场。工业化的加速提高了这些国家的经济实力，也更有效地发挥其国内市场潜力，使其更全面、深入地参与到全球化进程之中，为国际力量对比的改变提供了经济条件。如金砖五国的 GDP 总量在 2010 年占到世界的 18%，贸易额占世界的 15%。根据对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2000—2009 年多份研究报告的参考比对，下列数据可以说明世界经济格局所呈现的大变革：153 个发展中国家在全球 GDP 中的比重由 2000

^① 联合国人居署编 《贫民窟的挑战——全球人类住区报告 2003》，于静等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3 页。

^② Saskia Sassen.

年的 22% 升至 2008 年的 47%，在全球贸易中的比重由 2000 年的 36% 升至 2008 年的 45%。全球 30 大经济体中有 12 个是发展中大国，其中前 10 大经济体中，新兴力量占了 3 个。中国在 2005 年超过英国成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2010 年超越日本成为第二大经济体。巴西在 2011 年超过西班牙、加拿大、意大利和英国而位列第六，印度则成为第 11 大经济体。更为重要的是，与发展中国家快速工业化形成对比的是，发达国家正在经历着“去工业化”过程，第二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持续下降，这直接影响到国内就业率的稳定。而工业化与“去工业化”之间的重要因果链条则是资本的跨国流动产生的新的国际分工。

交往工具的改进一直是全球化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技术支撑。以计算机、互联网技术为代表的信息化使“地球村”成为现实，地球上每个角落的每个人都亲身体会到全球化的存在。根据 internetworldstats.com 的统计，截止到 2011 年 3 月 31 日，世界互联网用户总规模突破 20 亿，从 2000 年 12 月 31 日到 2011 年 3 月 31 日，互联网用户的增长率达到 480.4%，亚非拉地区的增长率超过 500%。信息化不仅加速了资本、物质等的流动，也为知识价值的传播、思想观念的交流交融交锋提供了新的平台和空间，加深了人们对于自身、他人、共同体以及整个人类的认识，带来了认识和观念的不断变革。在很大程度上说，信息化的发展是目前的全局化区别于以往全局化的最重要的特征。

21 世纪以来，市场化、城市化、工业化、信息化的发展为全局化的扩展和深化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有利条件，并且放大了全局化的正面和负面影响，这既可以加速发展，也会导致更多的全局性风险，从而使个人、各类社会组织以及每个国家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

第二，随着全局化向多层次、多领域的扩展，全局化进程也在改变着“西方中心”的局面，向多种力量共同参与和推动转变。全局化是一个多层次、多维度的历史进程，但是长期由西方主导，因此全局化也被一些人称为“西方化”“美国化”，甚至“麦当劳化”，以强调西方国家、社会乃至企业拥有的决定性地位。但是，随着越来越多的社会主体，尤其是非西方社会主体被卷入全局化进程之中，并且不断强大起来，“西方中心”的局面正在发生深

刻的改变，全球化呈现出更强的多元性。

首先，非西方国家的快速崛起，推动了世界多极化，改变着国际力量的对比格局。据统计，从2001年到2010年，“增长八国”（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韩国、墨西哥、印度尼西亚、土耳其）对世界GDP的贡献率与“七国集团”持平。^①而在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发生后的第一年中，中国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的贡献率为18%，美国则为14%。2000年以来，新成立的25个主权财富基金中，大部分属于发展中国家。目前来自亚洲的主权财富基金占有世界主权财富基金的40%，其中，中东国家的占有35%。^②非西方国家的影响力在国际事务中不断提升，在1999年成立的“G20”中，发展中国家有11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G20取代G8成为全球经济合作的主要论坛。德国《明镜》杂志总结21世纪第一个10年的时候说，这是西方“失落的10年”，因为西方制度并没有给人们带来期望中的财富、和平以及民主，反而是包括中国在内的非西方国家的快速发展，使西方人对自己的制度产生了更大的怀疑。^③

其次，在全球化进程中，不同国家、社会、民族、社会群体以及个人的主体意识不断增强，更为主动地来利用全球化带来的新机遇来发展壮大自己。全球化是交往扩大和深化的过程。各类社会组织的发展，电视、互联网的普及以及信息和人口的流动有力地支持了多元主体意识的增强。因此，有学者提出了“全球本土化”（glocalization）的概念来描绘全球化激发出来的地方、群体、自我的意识。“9·11”事件将社会组织、个人的力量极端地放大出来。不同社会主体在交往的过程中，通过与他者的互动、交流、比较，不仅更清晰地认识到自身，也找到了更有效强化和维护自我认同的方式。这些多元主体一方面在努力追求和维护自我的权益，从而使全球化进程呈现为各种利益

① O'Neill J, Challenges as the World Economy Adjusts, Goldman Sachs Asset Management, 2011.

② <http://www.swfinstitute.org/fund-rankings>.

③ Dirk Kurbjuweit, Gabor Steingart and Merlind Theile, The Lost Decade What the World Can Learn from 10 Years of Excesses. <http://www.spiegel.de/international/zeitgeist/the-lost-decade-what-the-world-can-learn-from-10-years-of-excesses-a-668729.html>, 12/28/2009.

的激烈博弈；另一方面也在积极阐发自己的价值理念，以赢得更多的追求者，从而使得全球化进程也体现为各种价值的激烈竞争。

最后，在多元主体参与的过程中，对于“西方中心主义”的反思也进一步深入。非西方国家的快速发展增强了摆脱“西方中心主义”思维定势、寻找西方之外发展道路的信心。国际社会对“华盛顿共识”的批判、对“北京共识”的讨论充分说明了这点，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进一步深化了这种反思。前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Kevin Michael Rudd）在一篇文章中说，此次全球金融危机已向人们表明：这是一场涉及体制、理论和意识形态领域的危机。它让人们开始质疑过去 30 年以来盛行的新自由经济理论。^① 在金融危机爆发后，西方社会也开始反思自身，有学者说，10 年前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华盛顿和许多国际金融机构把美国树立为亚洲国家学习的楷模，而今天，亚洲国家，特别是中国有资格给美国人上一课。^② 美国评论家法里德·扎卡利亚（Fareed Zakaria）在其所著《后美国世界》一书中颇为深刻地指出，美国在完成了把世界“全球化”的历史重任后，忘记了把自己的视角和心态也“全球化”。

第三，随着各国全球化程度的加深，国内与国际两个局面的互动更为紧密频繁，导致了国内问题的“国际化”以及国际问题的“国内化”。在全球化进程中，没有一个国家是可以“独善其身”的，根据美国《外交政策》杂志与科尔尼管理咨询公司（At Kearney）编制的全球化指数显示，虽然各国的排名每年有所变动，但是全球化水平都在稳定提升，全球化水平涵盖了经济、社会和政治三个领域。^③ 因此，各国都不再把全球化视为外在的力量或发展的背景，而是作为思考和推动本国发展的出发点以及发展的组成部分，并积极形成本国的全球化战略。

国内与国际的互动主要是在三个方面展开的：

① 陆克文（Kevin Michael Rudd）：《新自由主义败因，社会民主主义处方》。

② Harold James “The Making of a Mess Who Broke Global Finance, and Who Should Pay for It?”, *Foreign Affairs*, January/February 2009.

③ 更多详细信息可以浏览其官方网站：<http://globalization.kof.ethz.ch/>。

一是经济领域。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的边界更加模糊,生产要素的配置在全球范围展开,各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在不同方面都有所提高,而国际市场的变动对国内经济发展的影响程度也在加深。尤其是主要国家的经济联系更为紧密。“中美共同体”“中印共同体”概念的提出,形象地描绘了这些大国之间的经济互补性。更为重要的是,发展中国家之间经济联系的重要性正在超越它们与发达国家的经济联系。根据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统计,中国成为多个拉美国家的重要出口市场。智利为13%,秘鲁为11%,阿根廷为9%,哥斯达黎加为7%,巴西为7%。在进口方面,巴拉圭为27%,智利和阿根廷为11%,巴西、墨西哥和哥伦比亚为10%。^① 2005年以来,中国的银行对拉美地区贷款总额达750亿美元。2010年,中国银行对拉美贷款总额超过世界银行、美国进出口银行和美洲开发银行的总和。^②

二是社会领域。人员、信息的流动推动了各国公民社会的成长,也为全球公民社会的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持。社会组织和个人的国际化,也在潜移默化地改变着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在21世纪初,国际公民社会组织就达到了4.4万个。^③ 一方面,国内公众因为了解到国际社会的发展,对于本国政府有了更高的期待和要求;另一方面,他们也会通过国际化的组织方式来提升自己的影响力。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国内社会的国际化才导致了或者加重了众多国内问题的“国际化”。近年来发生的“阿拉伯之春”“占领华尔街运动”是这些变化的典型案例。

三是政治领域。各国政府更加重视双边或多边合作关系,并且主动寻找战略合作伙伴。这种趋势是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进入新世纪之后,各国全球战略意识的增强进一步推动其发展,主要大国之间建立了不同内容和形式的

① 《西报载文说中国对拉美越来越重要其增长放缓将影响拉美》,载《参考资料》,2012年5月2日。

② 《西媒说中国进出口需求增长带动拉美与亚洲贸易不断扩大》,载《参考资料》,2012年5月2日。

③ 安德鲁·库珀《重新建构全球治理:八项革新》,见戴维·赫尔德、安东尼·麦克格鲁主编《全球化理论:研究路径与理论论争》,王生才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269页。

战略伙伴关系。例如,2003年5月,中国与俄罗斯进一步充实了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提出了“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中国与美国在2003年就建立建设性合作关系取得重要共识。中印签署了《中印关系原则和全面合作宣言》等。此外,各国也更加重视发挥国际组织的作用,国家政治与国际组织作用之间的关系更为密切。

然而,对于每个国家来说,越来越多的国内问题是能够找到国际因素的,而众多国际问题的解决也有赖于各国之间的合作。这就给国家带来了新的挑战:一方面要防止国际因素影响国内问题的解决,就需要更强烈地主张主权的独立和完整;另一方面为了加快某些国内问题的解决,又必须求助于国际社会,甚至接受后者提出的苛刻要求。美国著名学者、哈佛大学教授丹尼·罗德里克(Dani Rodrik)就形象地说,现在出现了民族国家、民众政治以及全球化的“三难选择”,只能有两个能同时共存。^①

第四,全球化的发展也产生了越来越多的全球性问题和全球风险,全球治理的重要性日益凸显。21世纪以来,连续发生了一系列的全球问题和全球风险,其中包括“9·11”事件、全球金融危机、日本地震引发的海啸和核泄漏以及全球气候变暖等。因此有学者提出我们进入了“全球风险社会”^②时期。全球问题和全球风险是全球化的必然结果。一方面,全球化大大增加了风险的来源。全球化的核心内容是人员、物质、资本、信息等跨国界和大陆流动的加速以及各个国家、社会、人群相互联系和依赖的增强;这必然导致原来限于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的风险扩散到更多的国家和地区;这些风险在扩散的过程中,彼此间还可能产生互动关系,产生新的风险源,增强风险的后果。另一方面,全球化放大了风险的影响和潜在后果。风险影响的放大主要是通过两种渠道实现的。一是相互依存的加深增加了风险后果承担者的数量;二是发达的现代通信技术使更多的人意识到风险的潜在后果,也容易因

^① Dani Rodrik, *One Economics, Many Recipe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7.

^② 乌尔里希·贝克《“9·11”事件后的全球风险社会》,王武龙编译,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4年第2期,第72页。

为信息的不完整导致过度恐慌。

这些全球问题和全球风险构成了非传统安全问题的主要内容。非传统安全威胁包括了金融动荡、粮食短缺、能源紧张、环境污染、气候变化、非法移民、跨境犯罪、恐怖活动、传染疾病、产品安全问题等。非传统安全具有跨国性、不确定性、转化性、动态性等特点，日益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重要议题，它们带来的挑战往往超越国界的限制以及单一主权国家的能力，并且在一些方面与国家权力形成了不对称，其解决和应对需要依靠国家间乃至全球范围的合作，需要改革现有的国际组织和完善现有的国际规则。以全球恐怖主义为例，它摒弃了传统的战争方式，既不尊重敌国的主权，也不尊重保护它的盟国的主权。^①

随着全球性挑战日益严峻，全球治理的紧迫性和重要性更加凸显。全球治理已经从 20 世纪 90 年代宣传的一种理念成为了现实实践。在联合国的推动下，各国首脑签署了“新千年宣言”，“9·11”事件的发生推动了全球范围的反恐合作。2002 年各国首脑签署了《约翰内斯堡可持续发展宣言》，提出要在地方、国家、区域和全球各级为促进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和环境保护而共同努力。2003 年的 SARS 事件显示出世界卫生组织协调各国行动的重要性。全球气候谈判虽然步履艰难，但是推动了许多国家节能减排目标的确立和具体措施的出台。2008 年发生的全球金融危机则使全球经济治理提到了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的议事日程。“20 国集团”作用的加强，成为全球治理方面的最重要创新。^② 改革现有国际治理机制，推动全球治理也成为了“金砖国家”首脑论坛的重要议题。^③

但是，面对日益增多的全球风险，现有的全球治理无论在制度化还是有效性上都远远不够，既深受国家利益尤其是个别大国意志的制约，也困扰于各种利益的矛盾和冲突中。哈佛大学教授斯坦利·霍夫曼（Stanley Hoffmann）

① 斯坦利·霍夫曼：《全球化的冲突》，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 年第 4 期。

② 布拉德·格罗瑟曼：《创建新的国际秩序》，载《参考资料》，2012 年 5 月 24 日。

③ 金砖五国：《德里宣言》，2012 年 3 月 29 日。

曾说，“当国家被迫在经济竞争和保护社会安全网之间做出艰难的选择时，全球‘治理’就变得很脆弱了。对于制约美国自由行动的国际组织，美国总是表现出越来越明显的不耐烦。”^①因此，全球治理不仅要依赖双边、多边合作的深入发展以及地区性治理机制的建立与发挥作用，更有赖于国际秩序民主化水平的提高、国际合作协调的深化。

第五，在全球化进程中，国家间的竞争更为全面激烈，国家职能的发挥面临着更严峻的考验。伴随着国家间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程度的不断提高，综合国力竞争也更加激烈、全面。21 世纪以来，科学技术、人力资源、制度机制以及文化价值，都成为国家间竞争的领域，围绕市场、资源、人才、技术、标准等的竞争更加激烈。各国政府不仅重视由资源物质组成的硬实力，也更加重视制度文化所形成的软实力以及“巧实力”。^②各国争夺的核心是国家发展的战略制高点和道义优势。

国家间竞争的加剧，拉动了围绕战略要地、国际要道的争夺。以美国为代表的一些国家为了谋取在多维作战空间的军事优势，组建战略联盟对潜在对手实施战略围堵，增强了国际军事竞争的不确定性和不可控性。它们为了自身的战略利益，干预别国内政，用战争手段改变他国政权，也增大了国际军事冲突、政治动荡的风险。

国家间竞争的加剧也对国家职能，尤其是经济职能和社会职能提出新的要求。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使许多国家开始反思市场与国家的关系，检讨“华盛顿共识”的缺陷，并且将国家的介入看做是拯救经济的重要措施。因此，在西方主要国家的救市计划中，“国有化”成为了主要措施。这对于长期奉行新自由主义的西方国家来说，无疑是对其价值观和政策操作方式的挑战。对此，《纽约时报》不无调侃地说，我们都是“社会主义者”。《经济学家》

① 斯坦利·霍夫曼：《全球化的冲突》，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 年第 4 期，第 67 页。

② “巧实力”概念最早是由美国学者苏珊尼·诺瑟 2004 年在《外交》杂志上提出。2007 年在美国发表的《巧实力战略》的研究报告明确提出，运用“巧实力”进行对外战略转型，帮助美国摆脱当前困境，重振全球领导地位。该报告的作者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一国的综合国力包括“硬实力”和“软实力”，将“软实力”与“硬实力”巧妙结合便是“巧实力”。

杂志 2012 年 1 月的一期封面文章《国家资本主义的兴起》认为各国正在通过支持企业来缓解全球化的压力。尼尔·弗格森的一篇文章就以“我们现在都是国家资本主义”为题，因为各国政府支出的比例都已经非常高。如政府支出占 GDP 的比例，中国为 23%，占世界 183 个国家排名的第 147 位；德国排在 24 位，政府开支占 GDP 的 48%；美国为 44%，占第 44 位；奥地利、比利时、丹麦、芬兰、希腊、匈牙利、意大利、荷兰、葡萄牙和瑞典的开支比例都超过了德国；丹麦最高，达到了 58%。^①

国家社会职能遇到的最大挑战是收入差距的拉大以及由此造成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年轻人群体受到的冲击最大，反应也最为强烈。国际劳工组织估计，全球 7500 万年龄在 15—24 岁的年轻人没有工作，换句话说，每 5 个失业者中就有两个是年轻人。根据美国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的一项调查，近两年来 18—24 岁美国人中，就业率只有 54%。^② 2011 年 11 月，英国年龄在 16—24 岁之间的尼特族（“不上学、不就业和不受训的青年群体”，简称 NEET）人数达到了 116.3 万人，同比增加 13.7 万人。加入全球化使得一些发展中国家抛弃了平等主义和福利，并产生了高失业率。在阿拉伯世界年轻人的平均失业率超过 23%。收入差距的拉大尤其是青年人失业率的提升，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甚至导致骚乱，其中最突出的就是 2005 年的法国大骚乱、2011 年以青年人为主体的“阿拉伯之春”、英国骚乱以及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以至于 2011 年被称为“愤怒的一年”。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批评美国现状说，在美国，过去 10 年来上层 1% 人群的收入激增 18%，中产阶级的收入却在下降；而对于只有高中文化程度的人来说，收入的下降尤其明显——光是在过去 25 年里，就下降了 12%，因此，美国社会陷入了“1% 的人所有、1% 的人治理、1% 的人享用”的困境^③。

① 《弗格森分析中美及其所代表经济模式之间的竞争实质》，载《参考资料》，2012 年 2 月 20 日。

② 迈克尔·舒曼：《失业的一代》，转引自《参考资料》，2012 年 5 月 9 日。

③ <http://www.vanityfair.com/society/features/2011/05/top-one-percent-201105>.

全球化对国家经济社会职能的挑战，引发了对国家治理能力以及国家治理模式的热烈讨论。一方面，在全球化过程中，国家治理的重要性不断凸显，国家不仅是基本的治理对象，而且是主要的治理主体；另一方面，各个国家的治理模式和治理能力存在着差别，因此不能简单地用西方的治理模式来衡量优劣。相反，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新兴国家的快速发展，尤其是在全球金融危机中的良好表现，使西方治理模式受到更强的质疑。美国乔治敦大学教授查尔斯·库普钱（Charles A. Kupchan）认为，目前西方世界出现了治理危机，而许多新兴国家得益于经济力量转移，尤其是中国在全球化进程中趋利避害。他认为西方治理模式进入了明显的无效期。原因有三个：一是全球化已经使这些国家的许多传统政策工具失灵；二是西方国家民众要求政策解决的许多问题都需要一定程度的国际合作；三是国内社会公众情绪低落并且分裂严重，无法形成有效的公众参与、社会竞争以及制度制衡。^①

^① Charles A. Kupchan “The Democratic Malaise Globalization and the Threat to the West”.

目 录

Contents

- 导 论 21 世纪以来的全球化进程 杨雪冬 / 1
- 全球化进程中的美国 谢来辉 浦启华 / 1
- 全球化进程中的俄罗斯 徐元宫 / 44
- 全球化进程中的英国 张萌萌 / 70
- 全球化进程中的德国 李以所 / 92
- 全球化进程中的日本 朱艳圣 / 122
- 全球化进程中的巴西 靳呈伟 / 138
- 全球化进程中的印度 张淑兰 宋丽萍 / 162
- 全球化进程中的越南 郭伟伟 / 189
- 全球化进程中的伊斯兰国家 朱昔群 / 218
- 全球化进程中的中国 杨雪冬 / 241
- 面向全球化的中国治理改革 杨雪冬 / 255
- 同样的挑战，不同的应对 杨雪冬 张萌萌 / 264